

◎学术史话

清代《说文》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遗产

马延炜

东汉学者许慎所编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说解汉字的专门著作。清代汉学兴起后，学术研究重视文字考证、声音训诂，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强调“识字为读经之始”，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遂进入崭新阶段，形成了一门专门的“《说文》学”，并涌现出以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为代表的众多重要学者。清代《说文》学的兴盛和繁荣，不仅极大深化了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更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其中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和求实追求，是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深化了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自东汉成书后，虽历代传抄、校订不绝，但相关研究始终较为零散。及至清初，随着学术研究由理学向考据学转向，《说文》受到广泛重视。乾嘉学者普遍将研读《说文》看作是读书治学的基础，清代学者王鸣盛曾云：“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在这一观念的作用下，清人治《说文》者甚众，仅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有400多种，主要内容涵盖如下三个方面：

阐发体例。《说文》原书没有凡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其的阅读和理解。南北朝时期，虽有学者注意到其“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但并未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清人在研究《说文》时，特别注重对具体例的归纳和阐发。段玉裁注释《说文》时，常在一部之末或一字之下，随文论其体例，如“一”部“元”字下对《说文》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的著述体例进行了归纳，论证了“《说文》，形书也”的观点。王筠在段注基础上，“即许书而释其条例”，撰成《说文释例》二十卷。全书用1000多条例证，分40余条件，全面归纳了《说文解字》的体例，“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

推进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研究。汉字由形、音、义三部分组成，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通过“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文》系统构建了汉字的形音义研究框架。清代学者突破前代研究中或“重形轻音”或“重义轻形”的局限，主张“形音义互求”，将汉字的形体、声音、意义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并进一步提出“因形求义”“因形求声”“因声求形”“因声求义”“因义求形”“因义求声”的六种互求方法，不仅大大推动了相关研究，更纠正了《说文》原书中的一些错误。

开掘新材料。清人认为，“许氏以后，三代器铭之见者日益多，学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六书之条理，为六经之羽翼”，故在《说文》研究中，十分注重以金石材料（包括青铜器铭文、石鼓文、陶文、玺印、货币等）校勘字形、纠正讹误，并补充《说文》未收录的字。如段玉裁在为《说文》作注时，就曾利用宋人编辑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订《说文》未收录的“篆”字。晚清学者吴大澂撰写的《说文古籀补》，收录金文、陶文、玺印等4700余字。该书依《说文》部首编排，每字摹写金文形体，注明出处，为《说文》补充了大量的先秦文字。

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

《说文》学在清代的兴盛与繁荣，与学术研究在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向密不可分，本身就是传统学术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清代学者在研究《说文》过程中秉承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治学方法，又极大丰富和促进了传统学术的发展，将其推向高峰。

明确提出由文字以通训诂，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路径。清人鉴于明末王学末流轻视读书，空谈心性的弊端，强调考文知音在学术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指出“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明确提出“经之至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经过清人，特别是乾嘉学者的不懈努力，以语言文字学为核心的传统“小学”摆脱了以往从属于经学的附属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反过来为推进和加深经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丰富并深化了传统学术的校勘方法。作为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校勘在中国古代起源甚早，并在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别、详究编次等基本主张。清人校订《说文》，既继承了传统校勘学的核心理念，又有所创新。段玉裁注释《说文》，注重不同版本互校，前后文对校、据义例推校，提出“定底本是非”与“定立说是非”，认为“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輕鶻如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正是经过清人的努力，传统校勘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长足进步，更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果。经清人之手校勘整理后的许多古代文献，成为善本。

坚持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出自《汉书》，原指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整理、编校古籍时“务得事实，每求真实”的治学态度，清人治学，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学术研究必须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反对主观臆断。反映在《说文》研究中，即强调“无征不信”。桂馥撰写的《说文解字义证》，博取群书，每一字下征引的例证，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王筠赞其“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这种平实、严谨、强调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经过清代学者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学人广泛认同并尊奉至今的重要原则。

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

古人将以《说文》学为代表的的文字、训诂之学归入“小学”，视为研读经史、阐发义理的基础学问。但《说文》研究又是一项难度极大，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专门之学”，甚至有“古之所谓小学，老大犹莫究其业”的说法。清代学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安贫乐道、焚膏继晷，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态度读书治学，这种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值得今人倍加珍惜。

甘于寒素，安贫乐道。翻开清代的《说文》学史，可以看到，不少学者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研究的。段玉裁晚年右腿残疾，疾病缠身，但仍坚持注释《说文》，曾对友人说“贱体春病如故，栗栗危惧”；“说文注”恐难成矣，精力甚衰，既成而死，则幸矣”。书成后，则曰“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钮树玉早年以贩布为生，“舟车跋涉之间，必载经史自随，归则寂坐一室，著书终日”，稍有赢利，则以购书，“夜恒燃灯，从帐中读，久之帐尽黑”。所著《段氏说文注》六卷，纠正段注之失，多有依据。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清代学者为《说文》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举凡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无不耗费很长时间完成。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用三十年时间，其间曾任四川富顺、南溪等知县，时正值清廷征讨大小金川，“储待輶餉，无敢稍懈”，然“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纂稿改窜是书以为常”。桂馥“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余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又“绘许祭酒以下至二徐、张有吾、邱衍之属，为《说文统系图》”，“精力萃于是矣”。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说解汉字的专门著作，《说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说文》研究，不仅丰富了对该书的研究，更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其中所反映出的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是值得珍惜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湖湘《说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YBA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于再：青春里的一腔热血

李红英

今年正值“一二·一”运动80周年，回顾那段抗争的历史，心生无限的崇敬。这是一九四五年秋，“一二·一”四烈士之一的于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九月七日的信昨天晚上五姑母拿给我，当然我是高兴地不得了，尤其我有一对双胞胎外甥的消息，更加使我兴奋，我真想早点回来看家中的这一切，看看祖母、父亲、叔叔、姑母以及新有的一些弟弟妹妹们，我想如果滇越路一通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回家了。”然而，他再也没能踏上归途。

时间倒流到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于再还是杭州之江大学附中的学生。这个家境优越的青年本可安然避祸，却悄悄卖掉心爱的英国兰令牌自行车，瞒着父母，与同学们踏上了奔赴大后方的征程。从武汉到重庆，他做过旅行社练习生，当过轮船售票员，在战乱中艰难谋生，却始终不忘“为抗战出力”的初心。再通过向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姑母求助，最终辗转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迅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参加

过武汉保卫战，组织过为煤矿工人争取权益，在乡村建设学院开展进步活动，甚至化名“于培师”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作战。无论身在何处，他都谨守共产党员“活着干革命”的信念。

抗战胜利归国后，于再来到昆明南菁学校任教。归乡探望亲人终于近在眼前——他已经八年没有见过家人了。得知妹妹生了一对双胞胎，他兴奋地立即回信，憧憬着滇越铁路通车后就能回家团聚。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当国民党暴徒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投掷手榴弹时，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教师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制止。手榴弹炸伤了他的头部，最终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

或许在那一刻，他忘记了归乡的渴望，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保护学生，捍卫正义。宋庆龄为他题词“为民前驱”——这四个字，正是对他热血生命最精准的注解。他用生命践行了“死为党献身”的誓言，让青春永远定格在为民抗争的瞬间。

（作者系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

陈子丹 李雯

2025年4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1届会议上，中国与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碑铭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第18项世界记忆遗产。

该碑又称“郑和布施碑”或“三语碑”，是全球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块同时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的石碑。它立于明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在锡兰山（古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一座佛寺中竖立的诏谕碑。立碑旨在宣扬国威、改善与当地关系，并祈求庇护航海安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曾于海外多处立碑，但唯有此碑被发现并保存至今，成为这一历史壮举的珍贵实物见证。

石碑为灰黑色天然石材，高144.5厘米、宽76.5厘米、厚12.5厘米。碑额呈圆拱形，饰以五爪双龙戏珠浮雕，四周雕有中式花纹，体现了明代皇家工艺风格。碑阴光滑无字，碑阳则阴刻三种文字：中文位于右侧，共11行275字，以正楷直书；泰米尔文位于左上，横书24行；波斯文位于左下，横书22行。

据学者研究，立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首访锡兰时，国王亚烈苦奈儿态度恶劣并意图加害，郑和被迫撤离。为了避免再次途经时发生冲突，明朝廷决定采取主动，通过向寺院布施、向国王颁赐的方式换取和平过境。此碑制作精良，刻工纹饰优美，属“御制之碑”，其石材可能来自南京附近官采石场，在船队出发前即已刻制完成，随船运抵锡兰后竖立。

郑和立碑之事在《明实录》中不见提及，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锡兰》中记有郑和布施一事：“锡兰国，古狼牙须也。前代不通中国。或曰狼牙须，梁时通焉。本朝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赐国主亚烈苦奈儿，诏谕之。”文中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一事，但可见明人已知郑和布施之事。清人王韬《漫游随录》也有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有当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并说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曾赍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矣。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在描述自己游览当地一座卧佛寺时，突然说到郑和布施之事，并提到在郑和之后，不断有华人来此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经数百年，一直未被后人遗忘，当地人民不仅知晓其事，还引导来访华人参观。清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亦提及郑和，足见他出行至锡兰时，已知郑和立碑地点就在寺中或该寺附近。

此碑大约在清末流出寺外，不知所踪，直到1911年才被重新发现，据说是发现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林（H.F.Tomalin）的英国工程师，发现地点位于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加勒（Galle）古城，当时碑面朝下，被用作一处下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图为新华社记者伍岳摄

◎云南文史

息宰河边话团结

付春

污。但当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看到“殉町”地区“百蛮”叛乱使得西南一片狼藉之后，姜思睿对诸葛武侯南征时听取马谡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后能够抚定南中，一举成就三国鼎立局面的做法大为赞赏。姜思睿认为自己招抚万氏，和诸葛亮当年的安抚南中可一较高下，表明其为维护大明王朝的领土完整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并沾沾自喜。其后，姜思睿回师昆明途经今江川区海门桥时，看到抚仙湖与星云湖交界地区著名景点“界鱼石”时，因盛传界鱼石“石怪鱼惊”，使得抚仙湖盛产的抗浪鱼和星云湖独大的大头鱼、两湖相交，鱼以石为界，有两湖之鱼“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奇迹，由此触景生情，写下了“星云日向撫仙流，独禁魚虾不共游。岂是長江限天堑，居然尺水割鸿沟。煥然已扑殃池焰，解綱應消在沼濱”的诗，今天在界鱼石旁仍立有此诗的碑刻。

诗的前四句被当地人视为理解“鱼不往来”这一自然现象的圭臬。但事实上，姜诗所表述则有更强的政治意图，后四句则笔锋一转，论述“燎原已扑”“解网消相”“河清從此得相接”，表达的是一个象征少数民族皈依一统的代名词。所以“息宰河招抚普名声”，均记为：“天南妄自視為蠭，微慧焉能對大明。一紙不烦諸葛陣，片言何事亞夫營。昔凭虎柱削烽燧，今借河濱洗甲馬。息宰从茲千載後，今人傳是受降城。”张继孟改“版”为“归”，其意图就是去掉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从此百蛮不再反，归依中原，实现国家一统。其招抚地点选在弥勒朋普的“息宰河”这一地方，也是别具政治意图，“息宰”一词，说明从此止戈，由此“息宰从茲千载后，今人传是受降城”，“息宰”也成为了一个象征少数民族皈依一统的代名词。这对大明王朝而言，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次佳音了。

虽然姜思睿和张继孟对于他们招



《题界鱼石》诗碑 作者供图

招抚普名声和万氏，可以说是他们在西南军事行动的一次短暂的成功之举，虽然没有斩首报捷，但也暂时恢复西南的平静，维护了国家的一统。这对大明王朝而言，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次佳音了。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云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5YNNDXXJ51）的阶段性成果]



《题界鱼石》诗碑 作者供图

招抚普名声和万氏，可以说是他们在西南军事行动的一次短暂的成功之举，虽然没有斩首报捷，但也暂时恢复西南的平静，维护了国家的一统。这对大明王朝而言，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次佳音了。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云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5YNNDXXJ51）的阶段性成果]

水道的盖板。因年代久远并受海水侵蚀，碑面上的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已漶漫不清、缺损严重，难以完整辨认，所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容仍大体可识。石碑发现后引起很大轰动，对碑文的破解也取得成功。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泽德蒙·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释读出中文，印度两位专家释译了泰米尔文和波斯文。1959年，著名学者向达依据碑文拓片释出汉文，并撰写《郑和在锡兰所立碑》一文附录于其校注的《西洋番国志》中，这是中国最早的释文。此后中外学者结合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对碑文持续进行解读和研究，先后有多种成果问世。

斯里兰卡独立后，原碑被移至科伦坡国立博物馆收藏至今，是该馆仅有的一块中国碑，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英国伦敦博物馆和中国南京博物院存有碑文拓片。2014年5月，江苏省文物局派出3人工作组抵达斯里兰卡，为耸立在科伦坡国立博物馆中央的石碑加装玻璃保护罩并首次拓印碑文，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添加了中文说明和一幅用毛笔楷体直书的中文碑文，为全球华人参观该碑提供便利。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见证，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这座跨越山海的历史丰碑，见证了明朝和下西洋的壮举和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实，印证了15世纪初中国与南亚、西亚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语言、民族共存的故事，显示出古代中国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眼光，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反映出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文明互鉴、和谐共生，在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的同时，更有助于丰富世界记忆遗产的多样性。

（作者分别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民族宗教信息中心主任、档案学博士）